

中国企业“走出去”会减少其出口吗？

—浙江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关系层次的实证研究

余淼杰¹ 徐静²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No. C2011002 2011年1月5日

摘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utbound FDI)和出口的关系在中国究竟是互补还是相互替代呢？先前的研究由于缺乏企业层面的外向直接数据而无法进行较深入的研究。通过运用浙江省外向投资企业层面上自2006-2008年的数据，在控制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不同因素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浙江省外向FDI和出口的关系。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与出口存在着稳健的互补关系。这表明，中国企业“走出去”并不会减少企业本身的出口。企业外向直接投资与企业出口相得益彰。

关键词：FDI, 出口, 关系, 企业层次, 互补

JEL： F0, F1

¹ 通讯作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E-mail: mjyu@ccer.edu.cn；电话：010-6275-3109.

²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本科双学位学生

一、引言

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的争议话题,也是理论和实证研究中的热点问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贸易和投资的增加,这个问题的意义显得更为重要。对中国来说,长期以来中国更多的是在关注外商直接投资的问题,而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提出,需要更多地去关注对外投资,即外向FDI的问题,因此研究中国外向FDI和出口的关系就有了重要的意义。

在理论研究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主要有替代和互补两类。替代模型最早由Mundell (1957) 提出,认为商品流动和要素流动相互替代,故以FDI为形式的资本流动与以出口为形式的商品流动会相互替代。Buckley-Casson (1981) 指出,由于关税和运输成本,出口会导致更高的可变成本,当这些可变成本抵消了FDI所带来的更高的固定成本时,企业就会逐渐由出口转向对外投资,并最终完全由出口改为对外投资。Helpman等 (2004) 提出,企业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会逐渐由面向国内市场转为出口,再转向对外直接投资,也表明两者有替代作用。

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学者如Yamawaki(1991)则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互补的关系,如Lipsey-Weiss (1984) 指出企业的某个产品在海外市场的存在,包括销售和服务设施在海外市场的存在,都会增加那个市场对其所有产品的需求,从而增加其母公司的出口。具体的说,增加出口的机制有多种,例如Vettas (1998) 提出由于消费者的学习,企业所面临的需求会由于其在海外市场的存在而增加,Brainard (1997) 指出企业分支机构的销售和国际贸易都会增加市场规模,扩大知识产权优势,从而使两者相互促进。Lipsey-Weiss (1984) 也发现,相对最终产品,FDI和出口在中间产品上有着更为明显的相关关系,这为两者的互补关系提供了垂直生产关系方面的解释。

在实证研究方面,互补性和替代性均有被发现。例如Lipsey and Weiss (1981) 发现美国制造业海外机构的活动与出口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Blonigen (2001) 发现日本的汽车出口与日本汽车在美国的生产负相关,而与日本汽车零部件在美国的生产正相关。部分因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较为难以获得,先前国内的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大部分国家和行业上的实证研究都得出了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存在互补关系的结论。例如Lipsey and Weiss (1981) 利用14个行业数据研究,发现美国制造业海外分支机构的活动程度与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外国制造业在美国机构的活动也与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出口正相关。Yamawaki (1991) 也用企业层次的数据发现了日本对美国的出口与日本海外分支机构在美国批发业的活动有着强烈的互补关系。

然而,对更分散的层次上的数据的研究发现了替代的效应。Blonigen (2001) 试图将替代效应从由垂直生产关系产生的互补效应单独界定出来。他考察了10个特定的汽车零部件的产品层次的数据,发现日本汽车零部件对美国的出口与日本汽车零部件在美国的生产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上都显著的负相关,而与日本汽车在美国的生产显著正相关。他同样考察了关于11个最终消费品的产品层次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在这些产品上,日本的出口与日本企业在美国的生产之间有强烈的替代效应。此外,他指出,当企业选择在海外生产时,会有一个一次性的明显的替代效应。

目前在中国进行的企业层次上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特别是中国企业的外向对外直接投

资的数据十分难以获得。本文获得了浙江省各企业 2006-2008 年的外向 FDI 数据，因此试图在企业层次上估计外向 FDI 与出口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的外向 FDI 与其出口正向互补关系。这表明，中国企业“走出去”与企业本身的出口相得益彰。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简要描述浙江省外向直接投资在 2006-2008 年的基本情况。第三部分探索可能影响外向 FDI 的因素。第四部分描述数据、介绍实证计量方法并汇报计量结果。第五部分小结。

二、浙江省企业的外向直接投资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如《国家统计年鉴》统计的，2006 年我国非金融类的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 176 亿美元，而 2007 年上升至 265 亿美元，2008 年则近乎翻了一倍至 559 亿美元。要系统深入地研究我国企业的外向直接投资，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可以接触到全国各省“走出去”的企业的投资数据。但由于部分数据尚属保密，所以笔者无从全部获得。而据商务部统计，而就地区而言，广东、浙江、山东、湖南及甘肃五省在 2008 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基本占了全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半左右。其中浙江省在 2008 年的对外直接投资约为 50 亿美元左右，约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10% 左右。而且浙江当年的 GDP 为 3090 亿美元，也仅次于广东、山东及江苏，为全国第四大经济大省，相当于委内瑞拉一国的经济总量（3190 亿美元）。所以本文以浙江省企业外向直接企业为代表研究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情况。

我们的研究区间为 2006 年-2008 年。众所周知，全球经济危机始于 2007 年，所以这段时间的分析也就可以部分考察经济危机对我国企业出口和投资行为的影响。图 1 显示了这三年平均以来浙江省对外投资的行业分布情况。就全国而言，我国在 2008 年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最大的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 21.7%），然后是金融业（14%）、零售业（6.5%）、采矿业（5.8%）、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2.7%），制造业只占到 1.8%（见《中国统计年鉴（2009）》）。但在我们的企业数据库中，浙江省的情况却有所不同，服务业只占一小块，最主要的还是制造业。按照投资大小的顺序分别是纺织业、机械制造、服装、矿业和电子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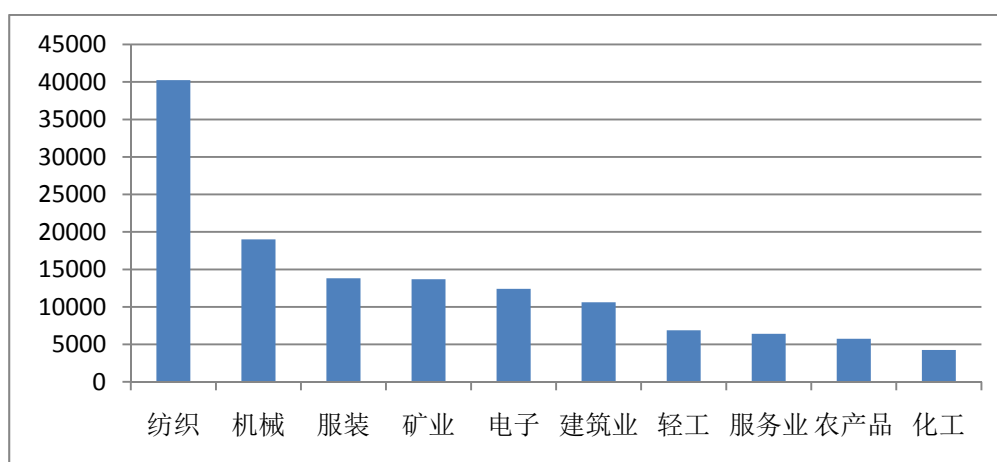


图1：2006-2008年浙江省企业外向FDI主要行业（万美元）

图2则列出浙江省企业外向投资的主要东道国分布。按投资额大小分布分别为香港、美国、越南、俄罗斯。香港名列第一，与全国的外向投资东道国分布情况是一致的（香港占全国外向投资63%）。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香港、开曼群岛与英属维京群岛都是投资的“避税天堂”有关。不同的是，虽然澳大利亚吸收的中国外向直接投资是除三大“避税天堂”以外最高的但浙江省企业向澳大利亚投资的不多，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矿业投资在浙江省外向投资中占比不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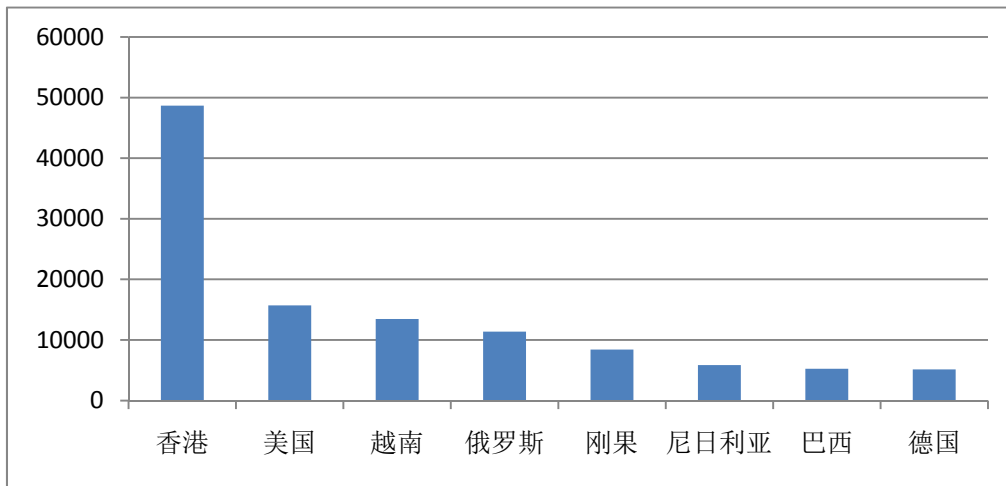


图2：2006-2008年浙江省企业外向FDI主要东道国（万美元）

图3反映了浙江省所有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机构类型。从图中可见，生产企业是最主要的一类，然后才是各类贸易公司以及其他。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提示。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生产企业在国内的生产情况特别是出口情况，进行较为深入的对出口与外向投资的关系作进一步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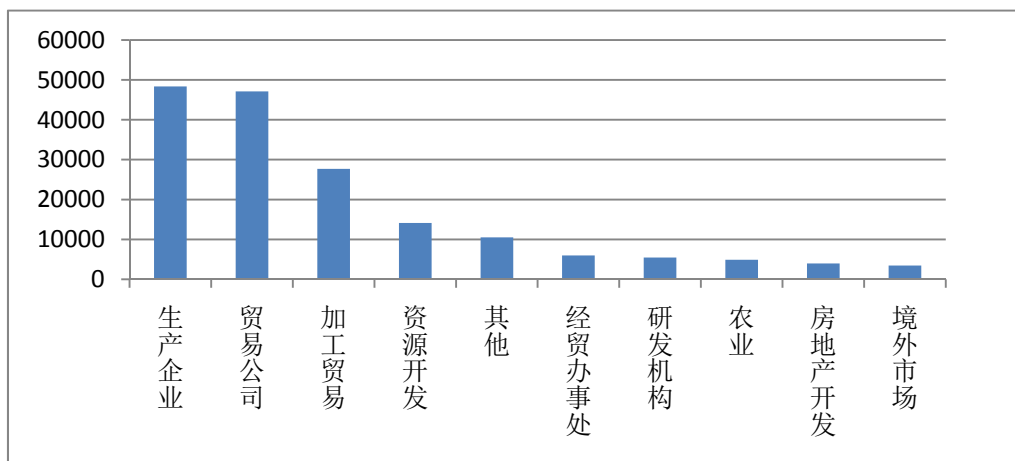


图3：2006-2008年浙江省企业外向FDI主要机构类型（万美元）

三、 外向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如前所述,本文重在研究外向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出口的关系。虽然可能影响企业的外向FDI因素众多,但影响外向直接投资的因素与影响出口的因素事实上是雷同的,可以用引力方程来解释。而如Feenstra (2003)指出的,影响双边国际贸易流的因素大致可归为三类:贸易国家经济规模的大小,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及自然贸易壁垒的大小。具体到本文,我们着重控制了如下几个包括GDP、汇率、关税和制度的重要因素。

第一个影响因素是国家的大小。理论模型认为,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都与两国整体的经济规模相关,而经济规模可以用一国的GDP来衡量。引力模型最简单的形式指出,双边贸易与贸易伙伴的GDP直接成比例。Baier-Bergstrand (2001)的实证研究也表明,GDP的增长可以解释战后以来大约67%的世界贸易增长,这说明了GDP对出口规模有着明显的影响。类似的,FDI同样与投资母国和东道国的GDP相关。

第二个因素是汇率。根据Froot-Stein (1991)的研究,汇率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联系来自于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完全,这使得企业从外部融资的成本要高于内部融资,因此投资东道国的货币贬值尽管可能减少以本国货币衡量的投资回报,但贬值可以通过系统性的降低东道国的整体相对财富来有效降低投资成本,从而增加对该国的投资行为。Blonigen(1997)进一步提出,对跨国公司来说,对外投资的目的可以是购买一些可以在整个公司中转移的资产,例如技术等,因此东道国的货币贬值可以降低成本,却不会降低回报。他的实证研究也显示,美元的贬值增加了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因此,我们预期人民币与中国企业的投资东道国货币之间的汇率会与中国企业对其的投资存在正向的关系。

第三个因素是关税。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避免出口所面临的关税,因此在关税较高的情况下更有可能用对外投资来替代出口以降低成本。因此,预期其它条件不变时,关税程度与FDI之间会存在正向的关系。但由于在实证研究中,许多企业层次的研究都必须用行业层次的关税数据来控制,因此很多此类研究,例如Grubert-Mutti(1991),Kogut-Chang (1996) 的研究,都没有得出明显的结论。

第四个影响因素是制度。根据Blonigen (2005) 的观点,投资东道国的制度质量是决定FDI在该国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对欠发达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制度反映了一国对资产的法律保护、市场的运作、腐败程度、基础设施建设等,这都与企业投资的风险、运作成本和预期利润密切相关。例如Wei(2000) 的研究表明,一国的腐败程度与在该国的FDI显著的负相关。因此,预期制度完善程度与FDI之间会有正向的关系。然而,尽管这些基本假设没有多少争议,但度量制度对FDI影响程度却比较困难,因为并没有哪个指标可以准确的度量制度。目前大多数的度量都是采取某种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的混合指标。

四、 数据和回归方法

(一)、数据

企业2006年-2008年外向FDI的数据来自于浙江省商务厅统计的浙江省各企业在中的外向FDI。企业的出口数据来自于海关,衡量的是对外投资的企业在投资所在年中的出口额。由于一些企业虽然进行了外向直接投资,但并没有在浙江省商务厅备案。所以在下面的稳健

性检验中，我们还定义了一个新的变量，即调整后的出口额 $EX_{it} \cdot E_{jt} / TE_t$ ，来估计企业对投资东道国的出口额，其中 i 代表企业， E_{jt} 代表浙江省在年 t 中对国家 j 的总出口额， TE_t 表示浙江省在年 t 中的总出口额。GDP 的数据在来自于世界银行根据当年美元汇率计算出的统计数据，以万亿美元为单位。我们定义了两个外资企业的虚拟变量（FIE），一个是包含了港澳台地区的广义的 FIE，另一个这是排除了港澳台地区的狭义的 FIE。具体来说，如果一个企业有吸收任何成分的外资，即定义为外资企业

在回归方程中用于衡量一国制度的指标，取自被广泛接受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的 2009 年年报。这个经济自由度指数主要衡量了一国政策和制度对经济自由的支持程度，其主要从 5 个领域度量经济自由，包括：1、政府规模；2、法律结构和产权安全；3、健全货币的获取；4、进行国际贸易的自由；5、对信贷、劳动力和商业的管理。最后总的 EFW 指数是这些领域指标的加总，最后得到一个 0-10 的评分，其中 10 是可能得到的最高分，0 分是最低分，分数越高表示经济自由度越高，也反映了企业所面临的制度环境越好。

回归中对汇率的衡量用了间接标价法，衡量了外币相对人民币的银行间汇率，数据来自于 IMF。回归中关税的数据来自于 WTO 的关税数据库，以 HS 的 2 位数行业分类为基础，对投资于同一个行业的企业所面临的关税采用了简单平均，而舍弃了涉及多个行业的企业的数据。

表 1 给出了回归所用各变量的基本信息和关键变量的简单平均相关数。在表一的第三组中，我们则具体描述具体的对外投资数据情况。

表 1：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第一组：基本统计数据				
变量列表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年	2007.04	0.77	2006	2008
对外直接投资额	1.48e+06	6.02e+06	0	8.00e+07
出口额	2.93e+07	7.22e+07	150	5.87e+08
对外直接投资的对数	12.56	1.55	9.21	18.20
出口额的对数	15.76	1.88	5.01	20.19
调整后的出口额的对数	11.89	2.43	1.47	18.24
FIE（包括港澳台地区）	0.26	0.44	0	1
FIE（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0.13	0.33	0	1
SOE	0.01	0.10	0	1
GDP	2.69	4.42	5.23e-04	14.09
汇率	100.89	387.25	0.04	2157.63
制度	7.59	0.90	4.77	8.97
关税	5.15	6.78	0	60

注：我们共获得 407 个观测值，各个变量的数据来源在文中进行了描述

第二组：主要相关关系

	(1)	(2)	(3)	(4)	(5)	(6)	(7)	(8)	(9)	(10)
(1) 对外直接投资的对数	1.00									
(2) 出口额的对数	0.13	1.00								
(3) 调整后的出口额的对数	0.17	0.86	1.00							
(4) FIE (包括港澳台地区)	0.08	0.14	0.13	1.00						
(5) FIE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0.04	0.07	0.07	0.65	1.00					
(6) SOE	-0.02	-0.03	-0.01	-0.06	-0.04	1.00				
(7) GDP	0.13	-0.03	0.36	-0.03	0.02	0.01	1.00			
(8) 汇率	0.00	-0.09	-0.15	-0.05	-0.03	-0.02	-0.09	1.00		
(9) 制度	0.14	0.12	0.28	0.11	0.03	0.12	0.12	-0.22	1.00	
(10) 关税	-0.03	-0.00	-0.15	-0.04	0.02	-0.08	-0.11	0.07	-0.56	1.00

第三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时间分布

频率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Pattern
138	37.60	37.60	. 1 .
109	29.70	67.30	. . 1
86	23.43	90.74	1 . .
12	3.27	94.01	1 1 .
9	2.45	96.46	1 . 1
7	1.91	98.37	. 1 1
6	1.63	100.00	1 1 1
367	100.00		X X X

其中由第三组数据的表格可以看出，90.74%的企业都只在其中一年里有对外直接投资，只有1.63%的企业在三年均有对外直接投资，另外有28家企业有两年的投资数据。可见，对这一非平衡面板，观察值的差异主要来自于企业间的区别而不是企业内部的差别。

在进行正式回归前，我们先简单拟合两个关键变量：企业外向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的关系。如图4所示，在2006-2008年间，企业的外向FDI与出口有着正向的关系，大部分观察值都落在95%的置信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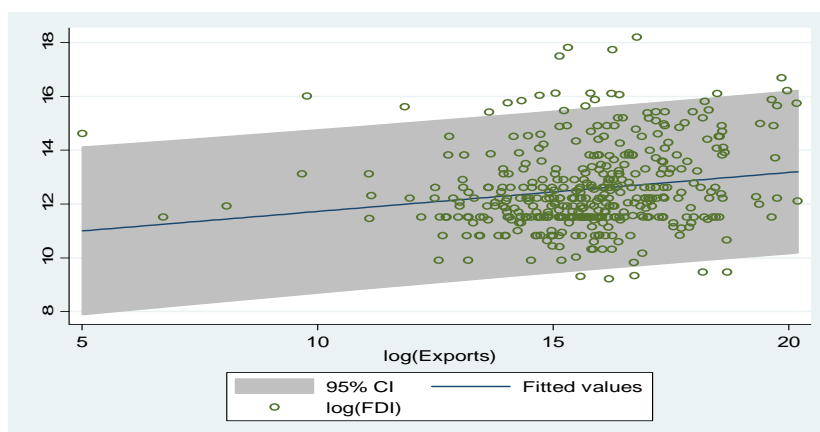


图 4：2006-2008 年各企业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
数据来源：浙江省商务厅和海关

图 5 则分别显示第一年中外向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从中我们进一步可以看出，三年分别来看，外向 FDI 和出口之间都有着正向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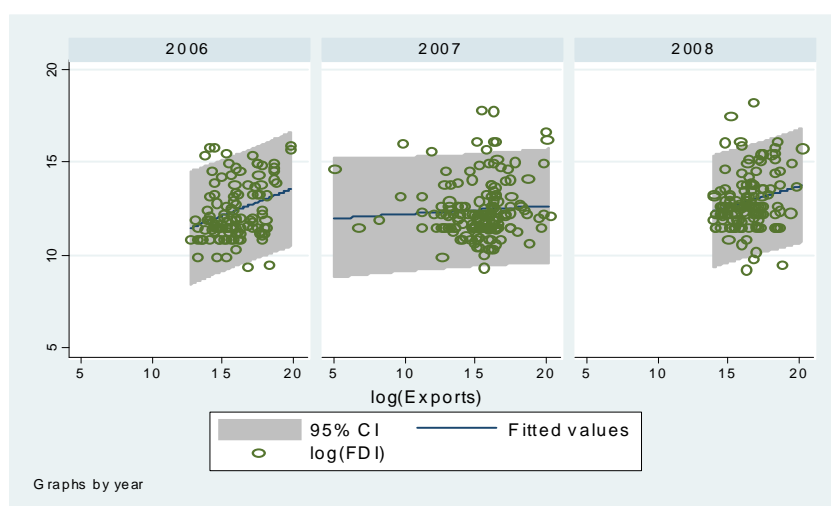


图 5：2006-2008 年各年企业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

数据来源：浙江省商务厅和海关

(二)、计量经济模型

根据以上的分析，企业出口、东道国的GDP、东道国货币与人民币之间的汇率、东道国的制度以及关税水平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因为这里的投资母国均为中国，所以母国的GDP水平没有进行考察，而把它吸收至误差项中³。因此，我们首先考虑如下的模型设定：

³ 事实上，加入中国或浙江省的 GDP 水平并不会改变回归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来信索取。

$$\ln FDI_{it} = \beta_0 + \beta_1 \ln EX_{it} + \beta_2 GDP_{it} + \beta_3 ExchangeRate_{it} + \beta_4 institution_{it} + \beta_5 Tariff_{it} + \beta_6 FIE_{it} + \beta_7 SOE_{it} + \mathcal{G}_i + \varepsilon_{it}$$

其中 i 表示企业， t 表示年份。这样，我们预期回归系数 $\beta_2, \beta_3, \beta_4$ 和 β_5 均为正数。由于我们的自变量中含有汇率这个仅随时间变化的因素，也因为回归时段较短（只有三年），我们的回归中不加入年份特定效用。

此外，我们还需要对外向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内生性问题作进一步思考。与其他大部分的实证研究不同的是，我们不可能在这两者之间建立因果关系：真实世界中的外向投资与出口本来就是互为影响的。所以，我们无需担心回归的反向因果问题。当然，内生性还有可能是由于缺省变量（omitted variables）引起的，对此，我们主要运用固定效用进行控制。具体到我们的数据结构中，这里总共有407个观测值，其中有367家不同的企业，这表明在选定的时间段中，大多数企业都只在其中的一年里有对外投资。因此，这里的差异主要来自于企业自身特征而不是时间引起的差异，故我们选择了做组间（而不是组内）的固定效应估算。其他各种难以指明的效应都放入误差项中，这个误差项可以被分解为企业间随机变量 \mathcal{G}_i 和正态

分布的残差扰动项 ε_{it} ， $\varepsilon_{it} \sim N(0, \sigma_i^2)$ 。

最后，外向FDI和出口的关系反映在了出口的系数 β_1 上，我们研究的重点即是估计该系数的方向和大小。

五、回归结果

（一）估算

为了考察企业出口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我们首先运用最小二乘法估算出一个关于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基本结果，其结果可以从表2第一列中得到。接着，我们又加入了其它几个控制变量，放在第二至第四列中。随后，我们又进行了固定效应估算，其结果放在表2的第五列至第八列中。

在单独考虑出口的情况下，出口的回归系数 $\hat{\beta}_1$ 为0.1449，并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这表示企业出口1%的增加伴随着企业外向FDI 0.145%的增加，显示了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的正向关系。我们在第二列中加入了其他三个因素，即GDP、汇率和制度，结果出口的系数 $\hat{\beta}_1$ 为 0.1161，GDP的系数为 $\hat{\beta}_2$ 为0.0473，汇率的系数 $\hat{\beta}_3$ 为0.0003，制度的系数 $\hat{\beta}_4$ 为 0.2138，且这些系数都至少在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与之前根据理论讨论所得出的预期一致，外向FDI与出口、汇率、东道国制度正向相关。在第三和第四列中分别加入了广义和狭义的虚拟变量FIE，并且加入了关税以及虚拟变量SOE，尽管回归系数 $\hat{\beta}_1, \hat{\beta}_2, \hat{\beta}_3$ 和 $\hat{\beta}_4$ 改变不大，关税以及两个虚拟变量的系数 $\hat{\beta}_5, \hat{\beta}_6$ 和 $\hat{\beta}_7$ 都不显著，其中关税系数的不

显著可能是因为由于不知道企业出口的具体组成,这里的关税只能采用行业层次的平均数据,而这不是一个精确的估计,因而产生了较大的误差。第五至第八列是固定效应估计的结果,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即出口的系数 $\hat{\beta}_1$ 始终为正,并且与之前相差不大。在未加入关税数据时,其他的控制变量的符号也均与预期一样为正,且与之前的比较接近,但加入关税后结果变得不显著,可能与前面讨论的关税数据的问题有关。

表2: 出口对外向FDI的影响

因变量	最小二乘法				固定效应			
	(1)	(2)	(3)	(4)	(5)	(6)	(7)	(8)
对外直接投资对数								
出口额的对数	.1449*** (2.89)	.1161** (2.38)	.0883* (1.69)	.0920* (1.77)	.0865** (2.13)	.0808** (1.98)	.0612 (1.36)	.0648 (1.45)
GDP		.0473** (2.51)	.0428** (2.22)	.0420** (2.16)		.0391** (2.27)	.0361** (2.01)	.0361** (2.01)
汇率		.0003*** (2.59)	.0007** (2.19)	.0007** (2.17)		.0005** (2.47)	.0008 (1.29)	.0008 (1.27)
制度		.2138** (2.13)	.2930** (2.39)	.3013** (2.47)		.1721* (1.92)	.2712** (2.32)	.2774** (2.38)
关税			.0162 (1.32)	.0161 (1.30)			.0195 (1.39)	.0198 (1.41)
FIE (包括港澳台地区)			.1758 (0.93)				.0937 (0.50)	
FIE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1302 (0.51)				-.0836 (-0.34)
SOE			-.4319 (-0.34)	-.4663 (-0.36)			.5036 (0.56)	.4738 (0.53)
观测数量	405	391	347	347	405	391	347	347
Prob.>F	0.0040	0.0000	0.0017	0.0029	0.0006	0.0001	0.0077	0.0081
R ²	0.0310	0.0694	0.0562	0.0545	0.0410	0.0797	0.0595	0.0570

注: 括号里的数值是t值。*, **, *** 分别表示在10%, 5% 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里采用了依企业而定的固定效应。

(二) 更多检验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研究所采用的出口数据是企业投资当年的出口总额,然而企业对投资东道国的出口额可能可以更好的估计出口对外向FDI的影响。因此,这里用调整后的出口额 $EX_{it} \cdot E_{jt} / TE_t$ 替代总的出口额,以估计企业对投资东道国的出口额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其中*i*代表企业, E_{jt} 代表浙江省在年*t*中对国家*j*的出口额, TE_t 表示浙江省在年*t*中的总出口额。具体的回归结果可以从表3中得到。

表 3：调整后的出口对外向 FDI 的影响

因变量	最小二乘法				固定效应			
	(1)	(2)	(3)	(4)	(5)	(6)	(7)	(8)
对外直接投资对数								
$\ln(EX_{it} \cdot E_{jt} / TE_t)$.0936*** (2.70)	.1009** (2.30)	.0740 (1.56)	.0773 (1.64)	.0611* (1.93)	.0668* (1.74)	.0460 (1.07)	.0495 (1.16)
GDP		.0290 (1.35)	.0298 (1.35)	.0284 (1.27)		.0269 (1.47)	.0280 (1.46)	.0273 (1.43)
汇率		.0007*** (2.63)	.0007** (2.24)	.0007** (2.22)		.0005** (2.49)	.0008 (1.28)	.0008 (1.27)
制度		.1748* (1.68)	.2768** (2.21)	.2845** (2.28)		.1454 (1.57)	.2622** (2.20)	.2678** (2.25)
关税			.0176 (1.42)	.0176 (1.40)			.0205 (1.47)	.0210 (1.50)
FIE (包括港澳台地区)			.1821 (0.96)				.1016 (0.55)	
FIE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1340 (0.52)				-.0777 (-0.32)
SOE			-.4246 (-0.34)	-.4599 (-0.36)			.4947 (0.55)	.4645 (0.51)
观测数量	405	391	347	347	405	391	347	347
Prob.>F	0.0040	0.0000	0.0018	0.0031	0.0006	0.0002	0.0099	0.0107
R ²	0.0310	0.0671	0.0541	0.0523	0.0361	0.0777	0.0577	0.0552

注：括号里的数值是 t 值。*，**，***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里采用了依企业而定的固定效应。

具体的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还是固定效应估计，调整后的出口的系数 $\hat{\beta}_1$ 都为正。同样，其他的各个系数也均为正，尽管大多没有之前那么显著。总之，在各种回归中，研究的主要变量出口都与外向 FDI 正向相关，而其他几个影响因素也与预期一样和 FDI 正相关。

六、小结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首先考察了有关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不同理论。随后，我们考察了几种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重要因素。此后，我们用浙江省的企业层次的外向 FDI 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控制了这些因素后，外向 FDI 和出口之间具有明显的正向关系。此外，与我们预期的一致，外向 FDI 与投资东道国的 GDP、汇率和制度的完善程度正相关。这表明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与出口存在着稳健的互补关系。在这个层面上，中国企业“走出去”并不会影响企业出口，企业的外向直接投资与企业本身的出口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 [1] Baier, Scott L. and Bergstrand, Jeffrey H. (2001), "The growth of world trade: tariffs, transport costs, and income similar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3, pp. 1-27.
- [2] Blonigen, Bruce A. (1997), "Firm-Specific Assets and the Link between Exchange Rate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7, pp. 447-465.
- [3] Blonigen, Bruce A. (2001), "In search of substitution between foreign production and expor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3, pp. 81-104.
- [4] Blonigen, Bruce A. (2005),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FDI Determinan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299.
- [5] Brainard, Lael S. (1997),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Proximity-Concentration Trade-off Between Multinational Sales and Trad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7, pp. 520-544.
- [6] Buckley, Peter J. and Casson, Mark (1981), "The Optimal Timing of 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Economic Journal* 91, pp. 75-87.
- [7] Feenstra, Robert C. (2003), "Advance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8] Froot, Kenneth A. and Stein, Jeremy C. (1991), "Exchange Rate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 Imperfect Capital Markets Approac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 (4), pp. 1191-1217.
- [9] Grubert, Harry and Mutti, John. (1991) "Taxes, Tariffs and Transfer Pricing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e Decision Making,"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3 (2), pp.285-293.
- [10] Gwartney, James and Robert Lawson with Herbert Grubel, Jakob de Haan, Jan-Egbert Sturm, and Eelco Zandberg (2009).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2009 Annual Report. Vancouver, BC: The Fraser Institute. Data retrieved from www.freetheworld.com.
- [11] Helpman, Elhanan, Melitz, Marc J. and Yeaple, Stephen R. (2004), "Export versus FDI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 pp. 300-316.
- [12] Kogut, Bruce, and Chang, Sea Jin. (1996) "Platform Investments and Volatile Exchange Rates: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S. by Japanese Electronic Compani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8 (2), pp. 221-31.
- [13] Lipsey, Robert E. and Weiss, Merle Yahr (1981), "Foreign Production and Export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3, pp. 488-494.
- [14] Lipsey, Robert E. and Weiss, Merle Yahr (1984), "Foreign Production and Exports of Individual Firm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6, pp. 304-308.
- [15] Mundell, Robert A. (1957),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7, pp. 321-335.
- [16] OANDA Currency Converter, available at <http://www.oanda.com/currency/converter>.
- [17] Vettas, Nikolaos, "Demand and Supply in New Markets: Diffusion with Bilateral Learning,"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9, pp. 215-233.
- [18] Wei, Shang-Jin. (2000a) "How Taxing is Corruption on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2 (1), pp. 1-11.

[19] Wei, Shang-Jin. (2000b) "Local Corruption and Global Capital Flow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0(2), pp. 303-46.

[20] World Bank national accounts data, available at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21] WTO tariff data base, available at <http://tariffdata.wto.org/ReportersAndProducts.aspx>.

[22] Yamawaki, Hideki (1991), "Exports, and Foreign Distributional Activities: Evidence on Japanese Firm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3, pp. 294-300.